

DOI: 10.16783/j.cnki.nwnuz.2020.06.018

成都市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王梅梅¹, 薛晨浩², 曹宗英¹, 张宁珊¹

(1.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2. 西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 运用判别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的方法, 对影响成都市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愿意跟子女一起居住、帮子女带小孩、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习惯了合居生活、子女是独生子女、亲戚朋友都在附近、喜欢大家庭的热闹这些因素对代际合居(与成年子女一起居住)具有正向影响; 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年龄比较高、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大和觉得养老机构可以减轻子女负担的老年人会考虑养老机构居住; 配偶健在、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文化程度比较高、喜欢私人空间、亲戚朋友都在附近这些因素对代际分居(仅与配偶居住)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关键词: 城市老年人; 代际合居; 代际分居; 养老机构居住;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K 90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8X(2020)06-0109-07

Analysi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elderly living pattern in Chengdu City

WANG Mei-mei¹, XUE Chen-hao², CAO Zong-ying¹, ZHANG Ning-shan¹

(1.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Gansu, China)

Abstract: Chengdu City is choosed as the research area in this paper, in-depth interviews and social surveys in large scale were conducted to obtain data on the elderly's living patterns, via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o recogniz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elderly's living mode choice in Chinese c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lose to the work place of their children, be willing t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having only child, taking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used to living together, relatives and friends are all around, loving the excitement of a big family,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intergenerational co-living.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raising children for old age, fearing of being abandoned by children, and scared to the high cost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have a certain positive impact on intergenerational co-living. The elderly who bear all the living expenses by themselves or their spouse, relatively old, having different living habits from their children, will consider living in the pension institution. The absence of children, unwillingness of children to live together, holding elderly care services are relatively complete, have a certain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lderly's going to nursing institutions. Owning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house, spouse is living,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high, bearing all living expenses, liking private space, relatives and friends are in the vicinity, are positive to intergenerational separation(live with the spouse only). Getting used to the current life

收稿日期: 2019-10-09;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20-01-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571155); 中央高校科研基金资助项目(lzujbky-2019-31)

作者简介: 王梅梅(1988—), 女, 甘肃庆阳人, 讲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与规划。

E-mail: wangmm@lzu.edu.cn

state, fearing of rejection from children, having great difference in living habits from children, have a certain positive impact on intergenerational separation.

Key words: urban aged people; intergenerational household cohabitation; intergenerational household separation; live in nursing homes;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居住模式(Residential model)是老年人养老模式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影响城市社会的组合结构^[1]。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观念的变化,居民的居住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影响了家庭组合结构,直接影响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使得城市的养老问题更加突出^[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口老龄化将会影响居民的代际关系及代际支持^[3]。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及中国目前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医疗健康保险制度不完善的现实,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养老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模式,家庭养老(与子孙同居)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养老模式。老龄人口基数的激增和生育率的逐年降低,导致了代际合居家庭的减少^[4],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模式选择常态化,并且模式多元化。研究转型期中国城市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影响因素,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乃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福祉。探讨中国城市老年人居住模式,分析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应针对不同居住模式提出对策。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了“在适合环境中养老”的理念^[5-6],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率先在英国推行,并在80年代逐渐发展成熟,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成为研究热点。西方对于居住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及多元化养老^[7]、照料模式^[8]以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9]等方面。由于养老与经济实力匹配,西方研究主要体现在不同群体如何建立多元化居住模式,以满足其对于养老保障的多元需求,而很少关注居住模式选择中的经济供养问题。我国对养老问题的全面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基于家庭结构变化的中国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居住模式的释义及其分类、现行居住模式研究和居住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大多以实证为主,根据模型的结果来分析影响老年人居住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养儿防老”的意识在养育男孩的父母中更为常见^[10],同时非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有明显的“养儿防老”观念^[11]。居家养老也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所选择的理想养

老模式,但是独生子女对于父母的支持力度在下降^[12]。养老观念和生活观念在不同的年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13],这种差别在地域上的分布也是影响不同居住模式的重要因素^[14]。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收入、疾病与居住模式均有关系^[15]。转型期,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传统的子代反馈的养老观念依然是主流^[16],居住模式在收入来源和子女的数量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差异性^[17]。老年人的居住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仅受到个人因素诸如年龄、性别等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显著影响。上述研究对于老年人居住模式大多是简单的统计描述,没有深入分析其中的机理。对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东部的一些发达省份,对于中西部的研究比较少,没有对社会文化因素对于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影响进行分析。

1 研究区与数据

文中选择成都市三环内的武侯区、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和金牛区为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于2015年9—11月和2016年3—5月的大规模调研数据。武侯区、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和金牛区问卷发放比例为1.7:1.5:1.2:1.1:1,抽样率为1/5000。调查对象的要求为:①年龄大于60周岁;②退休前或者现在在5个区工作,如个体户;③有成年子女在成都市区。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实际情况,采用封闭式题型设计具体问题,在成都市成华区做了小规模的试调研,然后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完成正式问卷。问卷的第一部分为个人情况,第二部分为居住模式及其考虑因素。共获得有效问卷1750份,有效回收率为96%,最后保留了1680份有效问卷(男女比例为7:8,60~65岁、66~70岁、71~75岁、76~80岁、81岁以上5个群组的老年人各336份)。采用SPSS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可靠性与一致性均符合运算要求。随后对指标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获取了影响老年人居住选择的重要因素^[18]。

2 居住模式选择的个人属性因素

目前成都市老年人形成了代际分居(仅与配偶居住)为主, 代际合居(与成年子女一起居住)次之, 养老机构居住作为补充, 多种养老形式并存的居住模式。调研发现现代际合居和代际分居是老年人认为较理想的居住模式, 尤其是年龄越高的老年人。同时, 代际合居和代际分居的老年人数量远远超过养老机构居住的老年人数量。

2.1 统计性描述

采用 SPSS 21.0 平台, 对最终问卷数据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置信区间为 95%), 最后选择了 12 个主要指标。统计中, 对问卷选项进行了赋值: ① 性别中, 男、女分别为 1, 0; ② 文化程度中, 初中以下、初中、高中、本科/大专、研究生分别为 0~4; ③ 工作类型中, 工人、事业单位、科研、商业与自由业主、医生分别为 0~4; ④ 与子女工作地的居住距离中, 子女在省外或者国外、乘车 1~3 h、乘车 >30 min~<1 h, 乘车 10~30 min、步行 10 min 以内, 分别为 0~4; ⑤ 其余指标选项中, 是=1, 否=0; ⑥ 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等指标在运算中采用了原始值(表 1)^[18]。

表 1 城市老年人生活模式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ividual factors of urban elderly's living pattern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0.67	0.47	子女是独生子女	0.83	0.37
年龄	73.94	7.68	帮子女带小孩	0.27	0.45
文化程度	2.27	1.06	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	0.61	0.49
退休前或现在的工 作	1.92	1.19	配偶健在	0.71	0.46
家庭人均月收入	3 524.27	2 673.77	愿意与子女一起居住	0.37	0.48
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	2.60	1.15	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	0.64	0.48

注: 变量的标准化公式为 Z 得分模型。

运用 SPSS 21.0 对自变量进行判别分析(Discriminate analysis), 在判别图的基础上采用 Fisher 函数判断各个自变量重要性程度, 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不同居住模式选择的影响程度, 接着建立判别函数方程, 根据 2 个方程函数的系数为 12 个指标的坐标, 结合组质心坐标, 构建成都市老年人居住模式选择偏好图。老年人的居住模式也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选择居住模式所考虑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很大的差别, 于是选择二元

logistic 回归对 3 类居住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分别进行分析。

2.2 居住模式选择偏好

2.2.1 判别图与特征值 通过 SPSS 软件, 得到判别图(图 1)以及分类函数系数, 判别图显示 3 个组质心就是居住模式类型, 以及围绕着质心的样本, 2 个判别函数 F_1, F_2 的解释度分别为 91% 和 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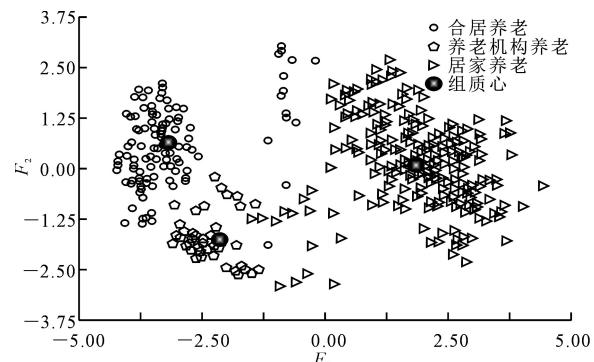


图 1 判别图

Fig 1 The discrimination diagram

2.2.2 Fisher 判别函数 用 Fisher 线性函数的系数确定 12 个指标的得分(表 2)。

表 2 指标得分

Tab 2 Index score

分类指标	合居养老	养老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
性别	6.86	5.87	4.60
年龄	1.70	1.74	1.69
文化程度	2.17	2.72	4.01
退休前或现在的工作	-0.13	-0.05	0.56
家庭人均月收入	0.00	0.00	0.00
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	8.72	6.56	4.38
子女是独生子女	8.97	8.37	6.22
帮子女带小孩	8.91	7.59	8.10
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	2.98	4.37	17.88
配偶健在	8.81	5.79	9.14
愿意与子女一起居住	4.55	2.24	4.00
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	4.89	5.88	6.10
常量	-97.23	-91.43	-93.54

各指标在不同分类变量的 Fisher 线性判别函数的系数显示:

1) 子女是独生子女、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帮子女带小孩、愿意与子女一起居住这 4 个指标与代际合居正相关。

2) 文化程度、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配偶健在、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这 4 个指标与代际分居正相关。

3) 年龄与养老机构养老选择正相关; 同时,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对其选择也会有正相关影响.

2) 性别、退休前或现在的工作、家庭人均月收入对于老年人居住模式选择影响不明显.

2.2.3 典型判别方程构建 典型判别式函数的算法为^{[19]138}

$$F_1 = \sum \alpha_i x_i, \quad (1)$$

$$F_2 = \sum \beta_i x_i, \quad (2)$$

得到的标准化的典型判别式函数系数 α_i, β_i (表 3).

表 3 标准化的典型判别式函数系数

Tab 3 Standardized canonical discriminant coefficients

指标	α_i	β_i
性别 x_1	-0.20	0.11
年龄 x_2	-0.04	-0.14
文化程度 x_3	0.35	-0.08
退休前或现在的工作 x_4	0.17	0.03
家庭人均月收入 x_5	0.12	0.19
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 x_6	0.59	-0.41
子女是独生子女 x_7	-0.20	0.01
帮子女带小孩 x_8	-0.05	0.22
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 x_9	0.80	0.17
配偶健在 x_{10}	0.09	0.50
愿意与子女一起居住 x_{11}	0.00	0.42
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 x_{12}	0.10	-0.16

通过验证样本的错判比率大小, 本次误判概率在 3 组数据中分别为 0.02, 0.06, 0.08, 说明模型有效地表达了样本的分类.

2.2.4 居住模式偏好图 通过 Origin Pro 9.0, 得到居住模式偏好图(图 2). 居住模式偏好图显示:

1) 愿意跟子女一起居住、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帮子女带小孩、子女是独生子女, 这些因素是影响代际合居的主要因素.

2) 配偶健在、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文化程度比较高, 是影响代际分居的主要因素.

3) 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和年龄比较高的老年人倾向于养老机构居住, 经济收入是生活质量的基本保证, 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老年人, 会选择养老机构, 这与王月惠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

3 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成都市老年人居住模式显示出了以代际分居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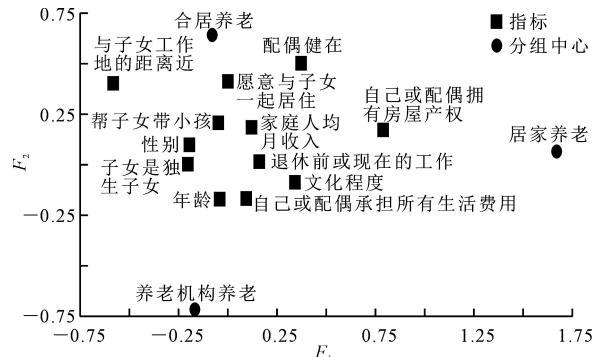


图 2 居住模式偏好

Fig 2 Living pattern preference

主, 代际合居为辅, 养老机构居住为补充的特征, 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影响这 3 类居住模式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不相同. 采用 SPSS 21.0, Pearson 相关性和 Cronbach α 值显示问卷结果可用.

3.1 代际合居的社会文化因素

控制其他变量不变, 用 logistic 回归对代际合居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模型整体正确预测率为 94.1%, 显著性 0.000 表示模型的整体显著性好, 结果可行. 社会文化因素与代际合居的交叉分析如表 4 所示.

表 4 社会文化因素对代际合居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Tab 4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OR 值
养儿防老	0.96	0.12	0.60	1	0.043**	2.62
习惯了合居生活	0.09	0.11	0.01	1	0.009***	1.09
亲戚朋友都在附近	3.40	0.16	4.71	1	0.003***	29.83
养老机构花费比较高	0.56	0.14	0.16	1	0.068*	0.57
担心被儿女遗弃	1.76	0.31	0.32	1	0.057*	5.78
喜欢大家庭的热闹	4.40	0.15	8.39	1	0.000***	81.19
常量	1.32	0.63	4.41	1	0.003***	3.73

注: 伪决定系数 Cox & Snell R^2 和 Nagelkerke R^2 分别为 0.265 和 0.379, (-2) 倍对数似然函数的值为 116.509; *, **, *** 表示在 10%, 5%, 1% 水平上显著, 下同.

1) 习惯了合居生活的显著性为 0.009, 亲戚朋友都在附近的显著性为 0.003, 喜欢大家庭的热闹的显著性为 0.000, 表示各因素在 1% 水平上影响显著, 即非常显著^[18]. 受“安土重迁”等传统文化的影响, 相对于年轻人, 老年人更加不愿意改变已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 同时更加喜欢跟熟悉的人一起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很容易

孤独, 所以他们会更喜欢大家庭热闹的环境, 当然, 这也是中国传统观念“天伦之乐”的体现。事实上, 与成年子女合居的老人不仅是教育和抚养孙辈的得力人选, 同时也是子女家务的好帮手^[21]。

2) 养儿防老观念对代际合居存在正向影响, 显著性 0.043, 表示其在 5% 的水平上影响显著, 即存在明显的影响^[18]。调查显示, “养儿防老”观念在 7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更为普遍, 他们认为孩子长大后应该赡养老人, 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 都应该好好赡养老年人。相比于年轻人, 这种传统观念在老年人群体中更加普遍和强烈。

3) 担心被儿女遗弃的显著性为 0.057, 养老机构花费比较高的显著性为 0.068, 表示此 2 个因素对于代际合居影响不明显。

3.2 养老机构居住的社会文化因素

控制其他变量不变, 用 logistic 回归对养老机构居住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模型整体正确预测率为 89.1%, 显著性为 0.000, 模型有效, 结果可行(表 5)。

表 5 养老机构居住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Tab 5 The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o the residential mode of old-age care institutions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OR 值
减轻子女的负担	0.15	0.22	0.52	1	0.047**	1.17
养老服务比较齐全	0.12	0.22	0.28	1	0.059*	1.12
子女在外地	0.04	0.22	0.03	1	0.085*	1.04
老人之间沟通比较顺利	16.20	36.56	0.00	1	0.100	108.66
子女不愿意住一起	0.02	0.20	0.01	1	0.091*	1.02
常量	0.66	0.01	2.17	1	0.004***	0.52

注: 伪决定系数 Cox & Snell R^2 和 Nagelkerke R^2 分别为 0.177 和 0.335, (-2) 倍对数似然函数的值为 35.734。

1) 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大在 1% 水平上对养老机构居住的影响显著, 显著性为 0.002。由于与子女的生活理念差别比较大, 两代人的生活习惯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于是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越大的老年人更加喜欢去养老机构居住, 这与左冬梅等^[22]的结论一致。

2) 减轻子女的负担的显著性为 0.047, 表示此因素对养老机构居住在 5% 水平上影响显著, 且正

相关。为了不给子女生活不添加生活的负担, 越来越多的城市老年人选择去养老机构居住。

3) 子女在外地、养老服务比较齐全、和子女不愿意住一起对养老机构居住具有正向影响, 显著性不明显。左冬梅等^[22]认为传统的孝道观念对于农村老年人选择养老院养老起到了阻碍作用, 慢性疾病所带来的医疗需求是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院的动机之一。事实上, 不同级别的养老机构的服务并不相同, 并且花费也存在很大差异^[23]。

3.3 代际分居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 对代际分居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进行 logistic 回归, 模型的整体正确预测率为 86.9%, 显著性为 0.000, 表示模型有效, 结果可行(表 6)。

表 6 社会文化因素对代际分居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Tab 6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intergenerational separation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OR 值
喜欢私人空间	0.31	0.22	8.05	1	0.003***	1.37
习惯了现在的生	0.26	0.17	4.25	1	0.013**	1.29
活状态						
子女在外地	0.04	0.13	0.11	1	0.745	1.04
怕子女嫌弃	0.19	0.14	4.75	1	0.018**	1.21
亲戚朋友都在附	0.23	0.15	8.19	1	0.001***	1.26
近						
与子女生活习惯差	0.26	0.16	2.42	1	0.012**	1.29
别大						
常量	0.30	0.58	4.73	1	0.000***	1.35

注: 伪决定系数 Cox & Snell R^2 和 Nagelkerke R^2 分别为 0.553 和 0.197, (-2) 倍对数似然函数的值为 79.098。

1) 喜欢私人空间的显著性为 0.003, 亲戚朋友都在附近的显著性为 0.001, 表示 2 个因素在 1% 水平上对代际分居的影响显著。其实很多老人选择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熟的社交圈, 有亲戚朋友闲聊散心是很多老年人养老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同时, 代际分居可以保留私人空间, 老人觉得更加舒服自在^[18]。

2) 习惯了现在的生状态的显著性为 0.013, 怕子女嫌弃的显著性为 0.018, 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大的显著性为 0.012, 表示以上 3 个因素在 5% 水平上对代际分居的影响显著。不愿意改变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是老年人延续之前居住模式的主要原因, 同时, 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大和怕子女嫌弃也

是老人选择代际分居的重要因素^[18].

3) 子女在外地的显著性为 0.745, 表示其对代际分居并没有很明显的影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理念的蔓延, 老年人对于养老的认识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 部分老年人也更加喜欢与子女分开居住^[18]。此外, 研究也表明, 代际分居是幸福感比较高的一种居住模式, 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独居, 则会增加老年人的孤独体验^[23]。

4 结论

居住模式是老年人的消费方式的调整过程之一, 关系到城市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综合分析结果, 得到以下结论:

1) 愿意跟子女一起居住、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帮子女带小孩、子女是独生子女、亲戚朋友都在附近习惯了合居生活、喜欢大家庭的热闹, 这些因素对代际合居存在显著影响。具有养儿防老观念、担心被儿女遗弃、觉得养老机构花费比较高, 对老年人代际合居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2) 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大、年龄比较高、觉得养老机构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这些因素促进养老机构居住。另外, 子女在外地、子女不愿意住一起和觉得养老服务比较齐全对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居住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3) 配偶健在、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文化程度比较高、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亲戚朋友都在附近、喜欢私人空间, 对代际分居有显著的影响。怕子女嫌弃、习惯了现在的生活状态、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大, 这些因素促进了代际分居。

老年人居住模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中国城市老年人居住模式通过影响家庭所需的住房数量及住房结构, 从而影响城市空间的内部组织行为^[24], 甚至是社会空间结构^[25]。随着“银发时代”的到来, 我国对于养老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 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老人逐步意识到“同住型赡养”所产生的负面功能, 老人与已婚子女同住的比例在逐年下降^[26]。当前情况下, 我国有必要借鉴改革成功国家的经验, 促进当前养老模式更加完善和成熟。应该加强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 促进老年服务

的财政投入^[27], 构建养老模式的 O2O 平台,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 满足日常养老的生活和安全需求。

参考文献:

- [1] STUCK A K, MÉAN M, LIMACHER A, et al. The adherence to initial processes of car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cute venous thromboembolism [J]. *Plos One*, 2014, 9(7): 100164.
- [2] DONG B R, DING Q F. Aging in China: a challenge or an opportunity?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2009, 10(7): 456.
- [3] ATTIAS-DONFUT C, OGG J, WOLFF F-C. European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and time transfers [J].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2005, 2(3): 161.
- [4] SERENY M.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adults in China: the interplay among preferences, realities, and health [J]. *Research on Aging*, 2011, 32(2): 172.
- [5] RUDA 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2): 93.
- [6] SANTOS S S. Caring for the aged at home: a help relationship in nursing [J]. *Revista Brasileira de Enfermagem*, 1998, 51(4): 665.
- [7] MEULBROEK L. Company stock in pension plans: how costly is it? [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2005, 48(2): 443.
- [8] GARCÍA-MANTRANA I, BERTUA B, MARTÍNEZ-COSTA C, et al. Perinatal nutrition: how to take care of the gut microbiota? [J]. *Clinical Nutrition Experimental*, 2016, 6(C): 3.
- [9] O'TOOLE B I, STANKOV L. Ultimate validity of psychological tests [J].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2, 13(6): 699.
- [10] 吕红平, 杨慧. 在校研究生预期养老意愿探析——河北大学 2004 级硕士研究生理想养老方式调查 [J]. 社会科学论坛, 2005(18): 51.
- [11] 刘佳. 独生子女对父母及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研究 [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5.
- [12] 王树新, 赵智伟.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与支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J]. 人口与经济, 2007(4): 54.
- [13] 刘二鹏, 张奇林. 代际关系、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2)的实证分析 [J]. 人口与发展, 2018, 24(3):

57.

- [14] 李小平, 桂莹, 张忆雄, 等. 不同地区机构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 2014, 34(4): 1023.
- [15] 邓颖, 李宁秀, 刘朝杰, 等. 不同养老模式老年人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2, 18(1): 44.
- [16] 龙书芹, 风笑天. 城市居民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江苏四城市老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07(1): 98.
- [17] 崔丽娟, 徐硕, 王小慧. 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与养老模式[J]. 中国老年学, 2000, 20(1): 3.
- [18] 王梅梅.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养老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6.
- [19] 白敬, 徐友, 魏新华, 等. 基于光谱特性分析的冬油菜苗期田间杂草识别[J]. 农业工程学报, 2013, 29(20): 136.
- [20] 王月惠, 朱秀丽, 苗秀欣, 等. 养老院与居家老年人生活质量比较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 中国护理管

理, 2011, 11(8): 36.

- [21] 汪娟. 城市居家老人与养老院老人依恋与孤独感的比较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2.
- [22] 左冬梅, 李树苗, 宋璐.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1): 24.
- [23] 王梅梅, 杨永春, 谭一洺, 等.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及其影响要素——以成都市为例[J].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96.
- [24] 柴彦威. 城市空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25] 王兴中.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26] 林鲜明, 金益基, 刘永策. 中韩两国老人选择居住方式的比较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46(6): 71.
- [27] 尹文清, 罗润东. 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养老模式创新与借鉴[J]. 浙江学刊, 2016(1): 174.

(责任编辑 惠松骐)

(上接第 108 页)

- [24] 苏飞, 陈媛, 张平宇. 基于集对分析的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以舟山市为例[J]. 地理科学, 2013, 33(5): 538.
- [25] 尹鹏, 刘曙光, 段佩利. 海岛型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及其障碍因子分析——以舟山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10): 234.
- [26] 田里, 田媛, 杨懿. 基于 TOPSIS 的大理州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7, 33(12): 1529.
- [27] 夏华丽, 刘雪珍, 曹诗图. 论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J]. 开发研究, 2013(2): 73.
- [28] 张明鑫, 谢树春, 李陇堂.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近 13 年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变化及环境健康效应[J].

经济地理, 2016, 36(2): 176.

- [29] 王梅梅. 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脆弱性评价[D]. 银川: 宁夏大学, 2013.
- [30] 刘继生, 那伟, 房艳刚. 辽源市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及其规避措施[J]. 经济地理, 2010, 30(6): 944.
- [31] 侯纯光, 程钰, 任建兰, 等. 环渤海地区城市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障碍因素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17, 40(1): 1.
- [32] 梁爽, 吴文恒, 强彦红, 等. 西北地区小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J]. 中国农业资源与规划, 2019, 40(7): 74.

(责任编辑 惠松骐)